

06

宜昌市 文史资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宜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节录)	吴玉章 (1)
吴玉章在宜昌	孙壺东 (4)
北伐军克复宜昌	张任夫 (9)
大革命时期宜昌革命活动回忆	易 朴 (15)
峥嵘岁月的回顾	胡楚藩 (26)
回忆大革命时期宜昌党组织	佟文正 (29)
西乡的农民革命斗争	覃元发口叙 王哲强整理 (33)
监狱里的斗争	吴远孝 (40)
国共分裂前后的宜昌市党部	张任夫 (51)
三十年代宜昌革命斗争琐谈	陈鸿儒 (60)
宜昌革命的追忆	简化生 (90)
抗战初期我经历的宜昌革命活动	陈 然 (114)
川小宣传队的始末	余新夏 (129)
党的上门坎交通联络站	黄恭恂 (137)
夏斗寅是怎样发迹的	荣 祐 (145)
夏斗寅师驻宜情况	刘梅森 (148)
叛变失败后的夏斗寅 (参考小史)	(151)
杨森在宜昌的前前后后	易史惠 (152)
目睹川军犯宜点滴	杨伯勋 邓实之 (173)
一九二七年宜昌要闻辑录	易史惠 (176)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节录）

· 吴玉章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广州政府迁移，党政负责人分路去武汉。有的走水路经过上海从长江上溯；有的走陆路，取道湖南；也有的取道江西。我走的是水路，到达武汉最早。十二月十日大部分负责人都赶到了。当时有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决定成立一个党政联席会议，以应付临时的一切事务。

我们一到武汉，就听到刚刚打下宜昌的各军发生了磨擦。宜昌是湖北的重要城市，地方富庶，又是出入四川的要道。但驻在宜昌的军队很复杂，有贺龙同志所率领的湘西民军，有新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黔军王天培、杨其昌部，还有后来以反共著名的湘军何键的第三师。因为贺龙同志的部队把军阀袁祖铭打死了，并和何键的部队发生了纠纷，这件事轰动了武汉，国民党右派议论纷纷，要求解散贺龙同志的军队；宜昌的地主商人也制造了许多谣言，并跑到武汉来控告贺龙同志。武汉政府便派我到宜昌去调查和处理这件事，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宋子文所推荐的一个人，负责去搞财务税收。我们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三师和兵员众多的袁祖铭余部已经剑拔弩张，作好战斗准备，就要向民军开火。民军处在人少、枪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会同意他们消灭民军的反动计划。

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但是调动民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宜昌的地主商人拿出四百万元来作为革命政府的军费。何键心里虽不愿意，地主、商人要拿钱出来，更是肉痛，但仍不得不服从命令。宜昌的这场纠纷就这样解决了。

我在宜昌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曾派出同志去组织工会及学生会等群众团体。这时武汉接连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武汉地区，在我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正蓬勃地发展起来。一月三日，汉口群众举行庆祝游行，队伍走到江汉关前，英国水兵开枪行凶，死伤群众三十多人。工人群众十分愤慨，立即起来驱逐外国巡捕，收回租界。武汉政府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接管了租界。这个举动象霹雳似地震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中国历届的政府从来都是唯帝国主义之命是听，如今武汉政府却一洗积辱，用群众的力量收回了租界，那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武汉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一月六日，九江工人也起来收回租界。英帝国主义鉴于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教训，不敢冒然使用武力。它除了进行威胁，并加紧拉拢蒋介石以外，同时也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抗议”，进行交涉。武汉政府不顾诱惑，不怕威胁，态度强硬，英帝国主也无可奈何。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有“铁腕外交之誉”。当然，武汉政府的这个铁腕，并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的铁腕，帝国主义那时所碰到的乃是全中国人民高举的真正有力的“铁腕”，所以它的一切诱惑和一切威胁都属徒劳。

汉口租界收回以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诱惑日益加紧了。一九二七年一月九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他这次武

汉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那时武汉的群众运动，非常高涨，工会、农会、学生会、童子团、商会等组织都已建立。国民政府召开了一次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会上蒋介石竟恬不知耻地丑表功，说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劳苦功高。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接着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意是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蒋介石受了群众正义质讯，恼羞成怒，却把怨毒之气全部转移到鲍罗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后，立即给徐谦（党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一个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接到这个电报，吓的不得了，打电报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这样我就星夜从宜昌赶回了武汉。

一九六一年

（摘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吴玉章回忆录》）

吴玉章简介 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被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八一南昌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去苏联、西欧工作。一九三八年回国后，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等职。曾被选为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七、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时年八十八岁。

吴玉章在宜昌

孙 壶 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由四川去到汉口。听说吴玉章同志从广东来到汉口，住在交通旅馆，就去拜会他。并对他说，我想回四川作军运工作。他很同意。不久，他和朱德同志给了我三十元作路费，让我回川。十二月下旬，我坐船到宜昌，这时，杨森在宜昌市一带的川军被唐生智的第八军何键师、叶琪师，第十军王天培及第九军第一师贺龙师、第二师杨其昌师打败。宜昌便有了唐生智和王天培以及贺龙，杨其昌各部驻军。但各部分队伍暗闹矛盾，王天培部抢机关很激烈。武汉国军政府委任吴玉章同志为鄂西特派员到宜昌处理一切。我正在宜昌等船，知道吴玉章同志来了，就到峡州饭店去看望他。只见他忙于接见各方人士及群众，非常忙碌，身边又没有一个人，我提出留在这里给他帮帮忙。吴玉章同志欣然同意了。于是我就留在宜昌当了吴玉章同志的私人秘书。

宜昌是湖北重要城市，地方富庶，又是四川、湖北进出货物的转运地。码头工人特别多。平日码头工人深受剥削，生活甚为痛苦，对国民党左派扶助工农的政策极表欢迎。吴玉章同志到宜昌后对码头工人的生活及工人运动十分关心，叫我常去和他们接近，帮助他们成立工会，宣传革命道理。我去了几次，但因我要帮吴玉章同志翻译各方面电文及办

理日常事务，实在抽不出好多时间去作工人运动。就在这个时候，四川的一位徐佑根同志到了宜昌，他自告奋勇愿去搞工人运动。我看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二马车长衫，套一件青布棉马褂。已是一位老翁了，很耽心他去搞不好工作。不料他才去几天，就把宜昌各行业工会纷纷组织成立起来了！以后，在宁汉分裂期间，他任宜昌工人纠察队队长，查获了许多蒋系反动份子。为保卫武汉革命政府，起了很大作用。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汉口总工会任职时牺牲！他在汉口受命留守武汉坚持工作之前一日，曾在街上送我和肖华清各一张像片，上写“亡友徐佑根之像”。我大惊，劝何不避一下？他说：“我准备牺牲！”其慷慨赴义之情，视死如归之气，令人感佩不已！

当时住在宜昌的第十军王天培，旧日军阀恶习未改，强将海关所谓“禁烟查缉处”（收鸦片烟税的）及征收局等财政税收机关占据，以致第九军贺龙、杨其昌两师的驻宜部队军饷无着，纷纷向吴玉章同志反映。吴玉章同志深恐他们之间激起冲突，影响北伐，乃以国府特派员的权力，逼说王天培遵从法纪，将各税收机关交给政府部门派去之人员接管；同时又向宜昌商会商量，每日借出两千元，发给第九军贺龙、杨其昌两师的驻宜部队，暂作伙饷。这使贺龙同志受到教育和感动，进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那时贺龙同志经常到吴玉章同志卧室密谈，商量国内大事。那时候我感到贺龙同志是一位魁武结实、幽默乐观而又精明强悍的人。

当时驻常德的革命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因叛变革命，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忽在常德被第八军一个团长诱杀，袁的嫡系部队尚在桃源等地，势有为袁报仇，反攻常德模样；唐生

智急令宜昌何键去兵支援。但宜昌的十军王天培早是袁祖铭部属，又担心其替袁复仇，就地起乱。何键以此向玉章同志请示，如何处理？吴玉章同志当机立断，直接将王天培及其师长找来，告以革命大义，要他立时发表通电，声明斥责袁氏，决心服从革命政府，拥护革命；再加上第九军贺龙、杨其昌两师支持，致使何键部队未得调走，宜昌治安也未受影响，而常德方面的袁祖铭嫡系部队，也悄然退向源陵去了。

不久，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因去南昌勾结蒋介石，在长沙被枪毙，驻在宜昌的第九军贺龙、杨其昌两师惶惑不安。经吴玉章同志作工作，贺龙同志早已倾向革命，接受国民政府所委独立十五师之职，开去武汉护卫革命中心，又转到河南参加了北伐；杨其昌也接受十一军陈铭枢改编也开到武汉，以后转到河南参加北伐。但杨其昌部改编之时，他有一个刘旅长大有意见，酝酿哗变。何键急派人来向吴玉章同志报告，玉章同志便写一信，叫我以他的秘书身份去会何键，派出部队警戒，预防变乱。我一时想到这样关系很大，不愿意去，并说“吴老师，这是一种军事行动，我怎么能去向何键提出。最好你亲身去。”吴玉章同志性格温良，淡然一笑置之。

吴玉章同志到宜昌时，四川省的泸顺起义，已经发动。泸顺起义，是在四川杨暗公、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发生的。起义前后，吴玉章同志都给予具体指导，热情帮助，大力支援。

在宜昌时期，吴玉章同志每三天都要接到杨暗公、李筱亭同志的密电汇报，而他总是立即作出指示回电。我记得，杨暗公同志曾于一九二六年的腊月二十八日从四川来宜昌和吴玉章同志密谈。吃了晚饭，又匆匆赶回四川，走前，他还对

我说：“孙壶东，我介绍你加入c.y.”。我说：“是的，陈仲宏都在万县向我说过，我已答应过了。”

杨暗公走后，吴玉章同志告诉我说，顺庆起义已经失败，部队只有一部分跟着刘伯承退到了开江。但泸州也干起来了，正等待着刘伯承同志去指挥。又说，还须多想办法，以支持四川的革命军事行动。据我所知，为了支援泸顺义军，吴玉章同志还从国民政府资助重庆中法大学的二万元经费中抽出两千元，由聚兴诚银行兑给万县某同志以慰问和支持泸顺义军。

杨森是个翻云复雨的人物。他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革命军赶出宜昌、沙市，退回万县之后，竟突然异想天开地断绝了川鄂轮船交通，妄图给宜昌及武汉施加压力。但不到一月，杨森的各处税收无法取得，粮饷产生了困难，他觉得这是个自杀办法。于是，借用罗觐光的密电本，突然来电，要求同吴玉章同志谈判，表示愿意恢复交通，改悔错误。又作出一些服从革命的姿态，如在万县开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说，准允各民主团体自由活动，接受党的教育等。吴玉章同志站在革命立场，允其所请。记得通航那天，从万县到宜昌的轮船约二十几艘，多是装的鸦片烟，所以税收极高。晚上，财政部禁烟查缉处处长邓元戎来向吴玉章报告说，共征得烟税八十几万银元。吴玉章立即告诉他拨出五十万给王天培部作为开拔费，以便王部能速去徐州参加北伐。

吴玉章同志在宜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实际上工作一月。——编者）。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武汉政府来电要他速回武汉。他走的那天，宜昌工会约集工人、店员及市民等几千人召开欢送大会，热烈欢送吴玉章胜利完成任务，返回武汉。

吴玉章同志对泸顺义军始终十分关心，在他去武汉前，还让我带信给杨森，望杨森发电支援泸州义军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但我到万县时，罗颢光对我说，杨森又靠不住了，我也没有把信交给杨森。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我由四川去汉口到中央党部会吴玉章同志。他首先问我：“泸州起义的部队出来没有？刘伯承已发表为暂编十五军军长。”我说“秦汉三、杜伯乾、罗颢光和我们都到了云阳，杨森不许走，出来什么呢？”

我到汉口后不久，汪精卫、唐生智叛变了革命，吴玉章同志赶去参加“八一”起义，以后为革命战斗终身。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他回国参加抗战来成都，我同肖华清许多同志去凤凰山机场迎接他和在宴会上才见到他，只见他身体还好，精神仍像当年，深为高兴。一九三九年他同林伯渠，王明在重庆参加参政会议，路过成都住在三道拐静安别墅。我也去会过他，报告过一些情况。

我跟随吴老在宜昌工作不到三个月，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有的事情记不太完整，有的日子也记不确切，但是，吴老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永远令我崇敬和怀念。

（原载重庆市政协编印的《重庆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转载时有删节。）

北伐军克复宜昌

张任夫

刘玉春拖兵去汉

一九二六年在国民革命军由湖南进入湖北，连克汀泗桥、贺胜桥，直叩武汉大门之时，北洋军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急令驻扎鄂西的北洋军队援救武汉。但是他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坐镇宜昌的卢金山，以认遵前令，防止川军蠢动，免得武汉腹背受敌为由，却按兵不动。只有第八师的一个旅长刘玉春，自告奋勇率部驰援武汉。后来刘玉春及湖北督军陈嘉谟，一同在武昌城被北伐军包围。

属于宜昌长江上游总部驻防的北洋军队，下起沙市，上迄恩施，有枪七万支之谱。这些部队是第七师、第八师、第十八师以及第三、第十八两个混成旅，外加一个暂编师和一个暂编旅。按北洋军队一个师的编制，满员是一万二千五百人，比北伐军一个军的实力大多了。

卢金山不听吴佩孚调遣是派性权位问题。早在萧耀南病故时，湖北督军位置按资历应由卢金山升任；由于卢原是皖系，吴佩孚却委任了陈嘉谟。此刻卢金山怎肯去救陈嘉谟？何况还有一个新离群投奔吴佩孚的刘玉春！

卢金山觅策计议

卢金山按兵不动，只在给吴佩孚颜色看，待价而沽。由于形势变化太快，革命军各方捷报频传，吴佩孚很快要完蛋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长江上游北洋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来了。卢金山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只有十八混成旅长升为二十六师师长的于学忠（此人后率部经鄂北、豫南拖带到山东参加“直鲁军”，最后混入奉军，得到张学良信任。于的胞妹于学荣，也出嫁给张学良胞弟张学铭为妻。西安事变后，于又为蒋介石重用，曾任河北省主席）和十六旅旅长张福臣及两个毛团少数人主战。会议找不到良策，后来接受了卢的参谋、出身陆大的荆州人田礼元的计划：第一，与川东军阀刘湘、杨森结盟；第二，缩短防线。恩施、利川等地盘让给刘湘、杨森，放弃沙市，颜德庆的第七师，也调宜昌集中；第三，暂作出中立姿态，长江上游北洋部队改称“保安军”，申言保境安民。对逮捕的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一律释放。在监狱中走出来的有杨逸棠、张清夫、王寿桦等。杨逸棠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部秘书，受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德委派，先头前往四川万县杨森那里去，路过宜昌时被捕的。杨逸棠出狱后，找到在北京平民大学念书、“三·一八”受枪伤回宜养病的共产党员李芳园（后来堕落成中统局本部大特务）。杨就按总政治部规定，委派李芳园、张清夫等七人筹备国民党宜昌市党部，开展工作。

卢金山实行田礼元计划后，杨森首先表示赞成，因而杨拒不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委任令。卢又通过田礼元的天主教徒关系，及韩慎之宜昌商会长的地位，向英、日驻宜领

事取得默契，工作进行似乎很顺利。可是实力颇大而又老奸巨猾的刘湘，却既不表示拒绝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的任命，又不肯公开表示支持“保安军”。卢同刘湘有长期勾结贩运鸦片关系，这时急于求得刘湘表态，就带了副官长景涌山、宜昌清乡司令方茂山（就是后来在重庆校场口民主人士集会上登台发言，拥蒋反共的那个坏蛋），亲往重庆求请支持。

杨其昌愧对迎请

国民党宜昌市党部筹委受杨逸棠委任，开展工作，他们组织力量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军阀等口号，“保安军”视而不见，竟不加干涉。尽管如此，大家都感到在异己军政权下活动，深浅不得，安全也成问题，切盼革命军早日到来。一天，张任夫偶然从田礼元弟弟家里，得到田礼元计划详情，赶忙向党部筹委报告，当即举行会议研讨。会议认为，为确保北伐胜利，应采取紧急行动，粉碎宜昌北洋军队。当时卢金山去重庆，群龙无首，真是大好时机。会上，张任夫提出，已同方茂山的秘书李某有所接触，方部可以利用；再利用某些方面枪支，加上革命群众，给北洋军队一个突然袭击，完全有成功的可能。由于筹委年青，缺乏军事知识，认为太危险，多数不同意。之后有人提出，说宜都县已看到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不如派代表去宜都。于是当场推定张清夫等七人前往。

次日晨张等乘轮船到达宜都，才知道是北伐军第十军二十九师师长杨其昌带有一个团的部队。张等一行见到杨其昌，将所有背景情况介绍给他，希他抓紧时机，火速行

动。可是杨其昌却说：“你们都非军人，尽管你们的情报都是准确的，可他们在宜昌有上万人，我现在一个团是不行的，等两天后面两个团来了，才考虑到宜昌去。七代表喋喋不休地缠住他，从白天说到黑夜，希他当机立断，不要坐失良机；如果卢金山一回宜昌，就百事俱非了。直到午夜二时，杨其昌才下决心，命令他的部队拂晓过江到北岸，直上宜昌。

七代表与杨一同到达宜昌下铁路坝时，代表们主张立即行动，缴北洋军队的枪，杨还是不敢动手，说“保安军”既无敌意，那就到市里后和平收编他们为好。代表们把杨其昌引到盐业公会驻地后，杨就跑商会，借重韩慎之中介洽谈收编。经过了两天，我们天天要杨动手干，杨总是不敢。

贺龙师果敢出击

正当杨其昌首鼠两端，奔走商会，乞求所谓收编时，北伐军贺龙率九军第一师的一个团突然来到宜昌。贺龙部来宜的原由是：国民革命军左翼前敌总指挥袁祖铭，曾对九、十两军下达命令，叫所部在枝江、宜都两县间集结，然后相机攻取宜昌。先头部队杨其昌部被宜昌同志说服后，一面行军，一面报告袁在湘西的指挥部，并催促在松滋县的两个团速赴宜昌。七代表在宜都时，本听说贺龙部先头在松滋的西斋，但以为时机紧迫，不能舍近求远，只好苦口婆心地说服杨其昌，以争取时间。至于所谓“保安军”，看到杨其昌懦弱犹豫，乞求收编，又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来，反觉北伐军也不过如此，因而对北伐军由惧怕变为轻视。卢金山去重庆时，总司令职权交由第八师师长兼施宜镇守使刘建章代行。刘是

一个酒色之徒，痴肥的，人称其为刘大肚子。平时刘在各部队就没有什么威信，在这样撑支危局的时候，又拿不出应变办法来，更没人听他的。第七师师长颜德庆在宜昌的外国医院割盲肠，真正是群龙无首的局面。再说广大市民群众极其痛恨北洋军阀，就都为贺龙奋雷霆之一击，铺平了道路。

贺龙真是少有的刚强果敢。他一到达宜昌下铁路坝，无视北洋军队这个庞然大物，不管杨其昌在搞什么，毅然决然地以大无畏精神，用庖丁解牛方式，见“保安军”就鸣枪缴枪。市民们一听在说缴北洋军队的枪，人们都涌上街头，纷纷为贺龙部的年纪轻轻的贵州兵助威，有的在指引北洋军队驻地，有的在指示追缴方向。这些贵州兵在贺龙熏陶教育下，也都是好样的。他们几乎是人自为战，单个行动的。虽然只有几百人，一下子就遍布全市，一群群北洋军跪地交枪求饶。在枪声停止，群众欢声正隆中，贵州兵却发起愁来了：面对大批枪支，不知怎样收拾为好，部队驻地也不知在何方。热心的市民们主动前来担任运输，将无数枪支弹药一齐运到“峡州大饭店”（现解放路原《宜昌报》社址，就是日本兽军轰炸后，饭店余存的四分之一）。这会儿，贺龙部所缴得的汉阳枪，人们估计每兵能摊上四支。

这时的杨其昌一闻枪响，急忙在驻地设置工事防守，等到明白是贺龙部在收缴北洋军队的枪械，才急着把他的部队拖出来。杨无可奈何，就将商会包围，缴了商团的两百支枪，聊以解嘲。

吴玉章调解争端

在杨其昌、贺龙到宜不久，紧接着就有八军第一师师长

何键率部到宜。杨其昌没有在北洋军队手中缴到一支枪，又眼红于贺龙缴得的大批枪支，于是就想借何键的力量，吃掉贺部，来瓜分这批枪支，也不枉自己是先被迎接来宜昌的部队。那时贺龙人少枪多，面对强敌，进退两难，只能困处钢筋水泥的峡州饭店大楼，处境是相当恶劣的。吴玉章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及时赶到宜昌，通过调解，把贺龙调到武汉去了。

吴玉章从武汉到宜昌，肯定是中共中央派的了。那末，又是根据谁的反映呢？我认为可能是这两个人：一个是贺部的政治部主任靳径纬。他北伐前在天津、广州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周恩来领导下，靳径纬都是很活跃的。另一个就是何键师的政治部主任，后来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段德昌（段的爱人肖知娣是宜昌人），不然的话，中共中央也不会在武汉大事如云，百端待理的時刻派出吴玉章的。想吃掉贺龙部的何键为何迟迟不动手呢？毫无疑问是段德昌起了劝阻作用。

至于在《吴玉章回忆录》里写吴老为调解矛盾，给贺龙师“四百万元”去武汉之说有误：那时是使用银币，宜昌从无这么大的财力。“四百万元”可能是整理者笔误。据笔者所知，是鸦片税收上，给了贺龙部四十万元的开拔费。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遺稿]

编者注：

文中叙述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第二十九师师长是杨其昌，但根据现有资料表明，该师师长是杨国祥，而杨其昌是第九军第二师师长。因之存疑。

大革命时期宜昌革命活动回忆



易朴

【编者按】易朴，又名易吉光，宜昌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宜昌县委书记，解放后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交通部公路设计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在上海病故，终年八十一岁。本文是易朴同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上海住院期间的回忆讲话，由宜昌县党史办公室录音记录。本刊作了适当的文字整理。所刊用的易朴同志的照片，摄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一)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宜昌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湖北省立第三师范，还有夷陵中学。那时，从武昌来了两个教员到三师。其中一个叫祖三竹，他不太多出面，据说他是共产党员。另一个叫冼百言。一九二六年，他们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学生